

10-13
吳江文史資料
85

吳江文史資料
1984年
第4輯



目 录

一、钱涤根烈士殉国纪念碑文	柳亚子	(1)
二、烈士钱康民传	柳亚子	(3)
三、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	王绍鏊	(5)
四、怀念我的父亲钮泽全	钮薇娜	(23)
五、赠莘莘学子——在欢送退休教师会上讲话	钮泽全	(29)
六、费伯埙先生事略	晓明整理	(32)
七、丝绸之乡的王雨生同志	刘亚明	(37)
八、倪慰农先生的爱国之心	张振昌	(43)
九、记我的太先生红云和尚	邵文长	(48)
十、吴江光复前后回忆	费璞安	(50)
十一、记辛亥年黎里农民一次自发的暴动	邵文长	(56)
十二、上海江南银行倒闭殃及同里存户	孙君正	(59)
十三、锦绣之乡——盛泽镇	楼六嘴	(62)
十四、盛泽镇丝绸历史遗迹	吴国良 柳德庆	(68)
十五、E·罗契的盛泽之行	周德华	(73)
十六、解放前盛泽金融业概况	周德华	(76)

——丝绸行业的血库

十七、盛泽绍兴籍人士对丝绸业发展的贡献

.....周德华(82)

十八、王倪寿芝输财办学事略.....王振威(87)

十九、热心办教育的黄亮叔先生.....徐贵通(90)

廿、松陵镇实验小学发展沿革年表

.....王有成 沈锡鼎(92)

廿一、陈去病与家乡戏剧活动.....任傅传(95)

廿二、回忆三·二五木刻社.....金文藻(98)

廿三、吴江古代塘路与驿站.....初基修(102)

廿四、吟「利“赞盛泽松糕”柳 哥(110)

廿五、太平军怒砸“铁沙锅”徐文初整理(112)

廿六、政协吴江县委历史沿革及历

届首次会议简介...陆中浩 仇怀耕搜集整理(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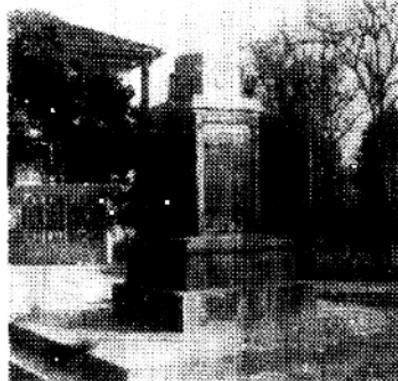
钱涤根烈士殉国纪念碑文

柳亚子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余与朱季恂、侯墨樵在广州，旅粤同乡设宴欢迎，始识同邑涤根钱君，戎服主事甚恭。座多四方俊彦，不尽吴人，有扬孚陈词者则四川郭鼎堂也。一时谈宴极欢，摄影与纪念而别。厥后，余以母病归里，愤慨时事，壮门不出。

会有以赠
缴相加者，
复变姓名走
匿沪上。荏
苒改岁，则
闻钱君以负
军事运动
责，殉义龙
华矣。悲夫，
悲夫！越十
年，国民政
府明令褒
扬，既营公
葬，复树纪
念碑于吴江

之中山公
园。遗孤康
民，乞余一
言以纪。余
窃自揆度，
一介孱书生
耳。甲乙之
交，沉酣于
理想，以为
太平大同之
治，旦暮可
期。始奋然
兴起，初创
吴江县党
部，继主江
苏省党部，



吴江公园内钱涤根烈士纪念碑

一九三七年立

握蛇骑虎，众既有年，终以志行落弱，拂衣归隐。桑海以

还、追念省部旧人，存者无几，而同邑诸友奔走疏附者，自张秋石女士以降，沈长公、汪大千、扬剑秋、陆剑飞、沈剑双、程良偁诸君亦相继溘逝。钱君尤觥觥膺烈士之称，求仁得仁，庶几无憾；余独草间偷活，偃蹇不死，读梅村故人慷慨之句，有不长谣当哭泪下沾襟者乎。病脑经年，焚笔推砚，既不欲以政治见，复遑忍以文字传。独我钱君之从容就义，灵爽可接，弗能终谢也。长吉呕心，未知死所，世有以工拙相绳者当地如腐鼠之吓矣。二十六年六月。

注：本文手稿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二月廿三日红军纪念节有作

马恩列斯堂堂在，我有孙毛誓勿疑。

来日大同新世界，五洲万国尽红旗。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作

注：红军，指苏联红军。是日为苏联红军三十周年纪念节。

烈 士 钱 康 民 传

柳亚子



钱康民烈士(1905—1938)

烈士钱康民，江苏吴江人，先烈涤根先生讳刚之哲嗣也。涤根久客江右，治军旅之学。国民革命军北伐，谋以淞沪响应，事泄，为李宝章所捕，就义龙华。厥后上海市区乃有涤根路为纪念云。康民早孤露，孀慈在堂，仰事俯蓄无所资，则谋以禄敷委吏乘田，非其志也。八一三战事起，偕同邑赵安民起兵于吴江之太湖，有程万军者与共事。程性剽狡，视军队为奇货，观望年余，卒弃顺附逆。康民以大义责之，程怒，几不测。既知事不可为，乃只身走浙境，召集旧部，驻兵于吴兴之双林，溇市，善溇诸市集间，一时称塘南义师云。顾程逆恭康民甚，则晋圉剿塘南之策于敌伪。康民卒部退塘北因溇邨，整理久之，军复振。忽一夕得谍报，言敌伪将来犯，即整队向西南行，意谓南方为友军驻札地，必无他虞也。至翌日拂晓，距因溇邨迤南已二十余里。敌军忽起于前，乃迎战。轰击二小时，众寡不敌，康民左胁及前胸俱中弹，与同志丁月槎等七人俱死之。时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康民年三十三。妻某氏，无男子子，有

女子子三人云。柳亚子曰：余与涤根同邑，顾初不相识。民十五偕朱季恂候绍裘游广州，涤根方供职黄埔，曾招余等宴饮，一时胜流咸集。其后余感激时变，退隐沪上，则涤根以殉义闻矣。康民在沪时，亦赏数谒余，顾无力振援之。距八一三前数月，吴江中山公园为涤根树纪念碑，康民索余撰文，墨渖未乾，倭难遽作。余杜门三载，亡命香岛，乃得见某君所为康被难纪略，爰摭括之如右。康民单丁无昆季，其遗嫠下奉孀姑，下抚养女，厄穷之状，未忍言宣。并世不乏慷慨慕义之士，倘有能慰涤根父子于地下者歟。

注：本文一九四一年载于光明日报。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

过 八 斥 遇 雨

陆 游

胜地营居触事奇，
酒甘泉滑鲈鱼肥。
松江好处君须记，
风静长江雪落时。

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

王绍鳌

一、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政党活动的回忆



王绍鳌（1888—1970）

辛亥那年，我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又参加国会的选举，当选为众议院的议员。因此，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政党的活动情况，略有所知。但究竟事隔五十年，加以自己当年写下的两卷大事记，在一九四一年日寇攻陷香港时，和放在九龙寓所的其他书籍一起，都已化为灰烬。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够想得起的点滴回忆，写在下面。

中华民族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立

清朝末年的知识分子，除了革命派和君宪派外，还有相当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在留日学生中，属于中间状态的也为数不少。他们学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法政，对于资本主义

国家的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最初虽没有参加革命的组织，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其中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革命，终于转到革命派这方面来了。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政权已呈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时，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我在上海见到了章炳麟。他一见我，就要我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

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大师。孙中山先生、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曾吸收光复会参加，并推章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章到南京谒见孙先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子民先生。章对孙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可见章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先生的。不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为了争权夺利，瞒着孙先生，暗中指使蒋介石刺死了光复会的军事领袖陶成章。这件事发生后，章对孙先生起了疑心，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也就有了施展的机会了。

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日益暴露，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是他篡夺革命果实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个形势，他一方面以北洋军进攻武汉，想迫使革命军接受议和条件，从而扼杀革命；一方面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革命派施展拉拢分化的伎俩，以扩大他的权势，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在

革命派力量，不仅各团体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就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也是互不团结的，而其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竟听之任之，没有想尽办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给了袁世凯以可乘之隙。正因为如此，联合会和以后的统一党，都不可避地成为袁世凯猎取的目的物，并且确实被他所利用。这是我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一一年（辛亥）冬，总部设于上海。会长章炳麟，下设总务、文牍、交际、会计四个科。其人选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鹏，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群，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绍鏊，会计科主任干事张弧。一九一二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事照旧。据我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凯派进来的奸细。张是熊希龄的人，也是袁世凯的亲信，袁就是利用熊的关系介绍张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济权一直操纵在张弧手里，其经费表面上说是从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以后随章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我们所花的可以说完全是袁世凯的钱。袁世凯的另一亲信王赓（即王揖唐），经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统一党后，袁世凯又利用赵凤昌（字竹君）去拉拢张謇。赵江苏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参事。张謇本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军领吴长庆到朝鲜时，张是吴的幕僚，曾受吴之命教过袁的诗词和八股文。但袁做了北洋大臣之后，就改称张为“仁兄”，不以师礼相待。张因此对袁很不满。然而，张本身也有弱点。他打着“实业救国”的招牌，和历任两江总督拉得很紧，在江苏挪用公款办了许多企业。在武昌起义以

前，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对他非常不满，大有威胁他缴还公款之势。他为了此来遑遑终日，寝食不安。到了清室即将全面崩溃的时候，张謇就乘机策动程德全宣布独立，此举既是为公，也是为私。以后在程德全任江苏民政长时，有人在民政公署内放火焚毁了有关公款出入的档案，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袁世凯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究系何人放火，固然是一个疑案，但袁之所以始终不追究此事，正是拉拢张謇的一种手段。

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员，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除了主要是江、浙两省的人外，以四川、云南、贵州几省的人居多；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的名望而参加的。

统一党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先生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约束袁的政治野心。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孙、袁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样，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统一党的这种妥协性不是偶然的。统一党的成员，包括我在内，大多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国会，并订出一部“象样”的宪法来，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国家可以富强了。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不仅认识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反而对他有种种幻想；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便妥协屈服了。

统一党改组为共和党时的内部分歧

参加统一党的人，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因此，统一党的内部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和章炳麟的学生四川人黄云鹏等，志趣相近，意气相投，当时自称为“少壮派”。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我们和张弧、孟森等人很不相同。我们始终主张限制袁的权势，不让他的野心得逞；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加以社会经验不足，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以致几次斗争都遭到了失败。一九一二年上半年，当统一党将要和国民协进会、民社等政团合并组成共和党时，统一党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在于究竟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呢，还是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为了扩张他的权势，企图把一些政党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籍忠寅为首的国民协进会，其后台是梁启超，梁是完全拥护袁世凯的，籍派人来和统一党联系合并的事，其动机可想而知。统一共和党是宋教仁领导的，其成员大多是同盟会会员。宋当时是袁政府的农林总长，因为要搞议会政治，也很想加强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个时期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反对改组为政党，所以他希望把统一共和党合并起来。宋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

密谈过好几次。统一党在改组成立时，吸收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这也是统一党被袁世凯和宋教仁看中的一个原因。在统一党内部，章炳麟和我们这些“少壮派”，不愿意完全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工具，主张与比较进步的统一共和党合并，不同意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张謇、熊希龄、张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们相反。在这一场斗争中，同我们“少壮派”站在一边的是少数，加以经济权掌握在张弧等人的手里，章炳麟也无能为力，结果还是决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共和党成立后，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章炳麟、张謇、梁启超等为理事，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党本部。以后，宋教仁的统一共和党并入了国民党。事后我这样设想：如果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组成政党，使为数众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跟着革命派走，中和左的两种力量汇合在一起，则以后情况的演变，可能有所不同，或者袁世凯还不敢那样过分地为所欲为。当然，这也许还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

因为我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便脱离了共和党本部。那时我十分迷信议会政治，一心想当议员，就继续待在自己的家乡——江苏，不愿意到别处去。不久，庄蕴宽任江苏都督，找我去担任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科长。不到半年，参、众两院选举，因为现任官吏不能竞选，我便辞去了这个职务。庄蕴宽为人比较开明，我和他来往密切。后来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召开约法会议，六十个约法议员中，五十九人主张总统制，只有庄一人主张责任内阁制，他的这个主张，也许是受了我的一些影响。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拢章炳麟，特地打电报邀请章到北京去“商谈国是”，又派专人（大概是王赓）来沪迎接。我

和黄云鹏等人随行。到京后章受到袁十分隆重的接待，并且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名义。章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衔，还向袁要了一万元开办费，到吉林走马上任去了。他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

共和党成立后，统一党中一部分与“少壮派”关系密切的地方组织，有一段时期保持了独立，没有和共和党发生组织关系。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后，王赓曾召集北京的统一党员，请章向他们演讲。原先我们还以为北京的统一党也保持了独立，没有并入共和党。但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才弄清楚北京的统一党完全是王赓一手搞起来的，不过打着章的招牌而已，实际上和章毫不相干。它不但没有保持独立，而且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党员的机构，到国会选举以后，又成了替袁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那时，宋教仁住在北京西郊三贝子花园（即现在的动物园），我常去看他，有一次，宋先生对我说：“现在情况既已如此，你们还是并入共和党吧！共和党内有比较进步的民社，而统一党还有不少青年人，双方齐心协力，还是能够推动共和党为革命做一些工作的。同盟会方面，现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组为国民党，你们并入共和党后，将来和民社在一起，可以和国民党互相提携。”我回到南方，便把宋教仁的主张以及在北京的见闻，对苏州的金天翮等几个保持独立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讲了，并建议他们不必再保持独立。后来这几个地方组织也并入了共和党。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过了两天因伤重去世。我和钝初先生平时过从甚密，他给了我许多教益。他的被刺，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

竞选议员的活动情况

一九一二年年底，参、众两院开始选举。会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举，每省十人；众议院议员由各省分区选举，名额按照各省各区的人口和纳税多寡比例分配。在选举中，我发现有贿选的情况。以共和党方面来说，因为我不赞成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就受到共和党本部的排挤，各省提“少壮派”的名，共和党本部总是通不过。“少壮派”几乎都是地方上选出来的，我就是得到同乡金天翮、金祖泽、钱崇威、费树蔚等老先生的支持而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在当选的过程中，我还几乎被共和党本部所排挤，地方上提了我的名，而共和党本部的特派员某人就来同我商量，要我退让，放弃竞选，我的朋友都不答应。接着，他们又派人到我的老家吴江县去收买我的选票，据我所知，吴江盛泽镇就有五票被他们收买去了。共和党哪里有这许多钱来进行贿选呢？无疑是袁世凯用勾结帝国主义搞来的大借款在幕后作祟。

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自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那时的选举有许多限制，例如，没有一定数目的财

产，就不能参加选举。竞选者知道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由此可见，当时从事政党活动的人，所争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绅权”而已！这些来自士绅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绅阶层，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绝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被袁世凯这样的人所利用。

进步党完全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

共和党组成后，在临时参议院中还不是多数党。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他能操纵的、足以压倒国民党的多数党，从而控制国会，为所欲为。因此，他又进一步策动共和党，同以汤化龙、林立民、蒲殿俊等人为中心的民主党，还有王赓一手搞起来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这个党终于在五月二十九日组成，仍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熊希龄、张謇、汤化龙、梁启超等人为理事。这个进步党完全是袁世凯的御用党。

在这次改组中，共和党内部又是意见分歧，再一次引起激烈的争执。以前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的“少壮派”，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坚决主张与国民党提携，共同监督袁世凯而同国民党相对抗的御用党。持这种意见的，共和党中有议员八十余人。其中以四川、江苏、湖北三省的议员居多，计四川有黄云鹏等近二十人，江苏有王汝圻、徐兰墅、胡应庚、解树强，王绍鏊等十余人，湖北有张伯烈、时功玖、胡鄂公、胡祖舜二十几人，另外还有其他各省的议员二十人左右。这八十余人，约占参、众两院议员的十分之一，是一个不小的力量。其中湖北的二十几人，大多

是和武昌起义有关系的民社社员，比较进步，又拥护黎元洪，所以也不同意合并。争执的结果，我们这一部分议员保持了独立，没有合并到进步党里去，并且抓住原有的共和党本部不放。有人称它为“新共和党”，其实是没有并入进步党的“老共和党”。由于共和党的分裂，袁世凯想使进步党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的企图始终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有继续从国民党内部去收买一些议员，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团，供其使唤。例如，刘揆一成立了相友会，梁士诒成立了公民党，孙毓筠也成立了××会（已忘其名），等等（其中刘、孙都是同盟会会员）。这些都是替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的机构。同时，这样一来，进步党的议席同这些小政团的议席加在一起，袁世凯才控制了多数。

民宪党活动和国民党、国会被解散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但当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大总统选举法”是“宪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选总统的建议书，对议员施加压力，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总统的决议，以后参议院也于九月八日议决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加毫无顾忌，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袁不久就借口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与临